

他们认为,包括社会背景等大量与教学无关的因素影响着学生的学习成果,学生学习成果不能作为直接的、唯一的测量教学质量的工具。而且,学生学习成果不仅取决于学校提供的教育质量,而且还取决于学生自身对学习的投入,因此对教学质量的评估不能一味强调学生学习成果,更应该开展对学生学习投入的调查。更重要的是,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目标是为了促进学生终身技能的发展,而终身技能的发展是难以被所谓的学习成果所测量。^[10]

通过学习成果的角度反映高校教学质量已经成为一种国际通用方法,但是如果将学习成果作为唯一衡量教学质量的方法和工具,忽视对投入和过程的测量,不仅难以对教学质量改进提供帮助,而且过于强调学习成果中的“满意度”和“就业成就”的倾向会对高等教育教学造成不良影响。高校教师组织——大学及学院联合会(University and College Union,简称UCU)已经开始担心高等教育院校为了提高其TEF分数而减少一些影响满意度的课程。^[11]在2017年10月对TEF实施第二年经验总结报告中,项目名称被修改为“教学卓越与学生学习成果框架”(Teaching Excellence and Student Outcomes Framework),可以看作是对之前将学习成果等同于教学卓越的修正,项目也将在专业评估中增加对学生学习投入的调查。

(二) NSS和DLHE的测量指标不能等同于学习成果

TEF采用已有NSS和DLHE的数据对指标进行测算,但是测量指标并不能等同于学习成果。NSS的题目是基于对“学生满意度”进行的调查,2017年版的NSS对TEF评估框架中涉及到的9个题目进行了修正,例如在“课程教学”维度将“教师们对所教课程充满激情”,改为“课程对我来说具有挑战性,并且促使我完成学习任务”;在“评价和反馈”维度中,将“我能够获得对作业的详细评价”改为“我能够获得对作业的有用评价”,修正后的题目更加突出学生在学习中的主动性。^[12]但是,基于学生满意度的调查并不能等同于学生的实际学习成果,而且学习需要的重复努力本就给学生带来一定程度的不满意。另一方面,“学生满意度”调查本身就存在对教育服务属性的误用:在商品交易市场上,理性消费者知道自己需要什么样的商品,因此能够对购买到的商品进行“满意度”评价,生产者也应该尽量根据消费者的反馈改进商品质量。但

是,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专业领域的服务不是简单的消费者与生产者的关系,教师不能仅提供学生“想要”的知识和技能,更重要的是要提供给他们“值得要”的知识和技能。^[13]

再者,将DLHE调查中关于“就业率”和“高技能就业率”的数据作为TEF专业评估的核心指标,过分强调就业成就对于大学教育来说是非常不利的。大学教育的价值并不在于学位证书给学生购买高位置、高收入职业的能力,恰恰相反,许多高收入职业是社会无用的,而许多社会有用性职业薪酬却很低。这样做只会让学生趋向于薪酬而不重视社会贡献,也会让文科学位逐渐被忽视。国家学生联合会(National Union of Students,简称NUS)同样认为就业结果不能表明学生真正获得了什么,并不适合作为衡量教学和学习质量的指标。^[14]

(三) 评估结果与学费挂钩催生社会问题

政府试图通过将TEF排名结果与学费涨幅挂钩的方法激励高等学校重视教学,这一计划从一开始就备受争议,预期结果也将带来负面效应。首先,高等教育部门认为政府并没有对高等教育教学提供实质性的激励,反而是通过新的评估方式加强了中央政府对教学的干预。TEF原计划在项目实施第三年时,获得“铜牌”级别的学校可按通货膨胀的50%提高学费与贷款额上限,“银牌”和“金牌”级别的学校可按通货膨胀的100%来提高学费贷款额上限。但是NUS认为政府并没有像报告中所说的那样为学生决定哪些机构可以涨学费、哪些机构将被关门的权力,涨学费的权力完全在政府手上。原本学生还能在提高学费的法案通过时产生影响,而TEF系统则可以让政府任意涨价,不用投票,不用问责。^[15]另一方面,根据最近的一项对全英国123所高等教育机构的8994名学生进行的学生调查显示,仅有22%的被调查学生认为将TEF项目和学费涨幅挂钩是合理的,更多学生认为与学费挂钩的方式会让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生因为学费负担而更多选择收取较低学费的学校,这将导致基于“社会地位”而不是基于“能力”的学生分化。^[16]2017年4月,经过长时间争论,政府在TEF和学费绑定以及其他高等教育改革方面的立法案与两院达成一致,TEF将在2019-2020学年被独立机构进行审阅总结,TEF的费用分级将延后至2020-2021年度。

四、对我国高等教育教学质量评估的启示

专业是连接学生和学校、课堂与教师的第一场